

# 對話

肖魯



香港大學出版社

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

香港大學出版社  
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 
興偉中心十四樓  
[www.hkupress.org](http://www.hkupress.org)

©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0

ISBN 978-988-8028-13-9

版權所有。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，  
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，  
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。

盈豐國際印刷有限公司承印

## 目錄

---

序	vii
引子	1
第一章	3
第二章	13
第三章	24
第四章	36
第五章	45
第六章	55
第七章	68
第八章	79
第九章	95
第十章	105
第十一章	118

---

第十二章	129
第十三章	141
第十四章	151
第十五章	160
第十六章	168
第十七章	177
第十八章	188
後記	198

## 第一章

2004年4月12日，中國北京最大的現代藝術網站「美術同盟」，在「新聞」一欄裏，刊登肖瀟的新作品《十五槍……從1989到2003》，主編吳易加以「編者按」：

通過肖瀟的新作《十五槍……從1989-2003》，再聯繫她在「89現代藝術大展」上那著名的一槍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帶有女性主義特點的作品是如何被社會、時代所「誤讀」的過程……



圖1：《十五槍……從1989到2003》行為，2003年10月。（攝影：李松松）

關於作品「十五槍……從1989-2003」

愛，

天知道。

恨，

地知道。

無愛，

無恨，

鬼知道

十五年前，當我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打了那兩槍之後，我和他；從北京東城區拘留所出來，一種無形的力量吸引我，從 1989 年到 2003 年，我們整整走過十五年。

今天，我又一次舉起槍，面對自己，一年一槍，整整打了十五槍……我們結束了。

我不善理論闡釋，更無從談論藝術，我只知道真實地生活着。作為一件作品，其表現形式對我來說，它的存在只是一種內心需要。它可以是一幅畫，也可以是一首詩，或者說，它需要的是用一把槍……，這一切的一切，取決於你在特定狀態下的心理走向。它不是用「藝術」這個詞所能解釋的，是一種求生的本能，是你的生命之所在。

肖瀟

2003 年 12 月 23 日於北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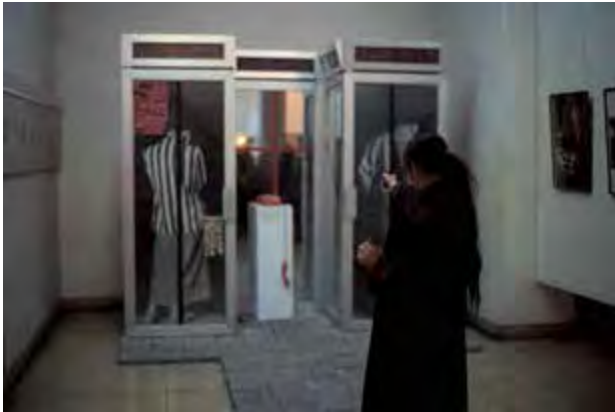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：《對話》裝置／行為。1989 年 2 月 5 日上午 11 點 10 分左右，肖瀟在北京中國美術館「中國現代藝術展」上，槍擊自己的作品《對話》。）

一個女人，在 1989 年冬天，在北京中國美術館，在「中國現代藝術展」上，打響震撼世界的一槍。

槍聲之後，中國美術館被關閉四天半<sup>1</sup>，世界四大通訊社美聯社、路透社、法新社和共同社立即報道該消息，國內媒體也爭相報道。一時間，這成為當時轟動國內外的新聞。

就在這一時刻，一個男人走進她的生活。一個偶然的錯誤，一個女人的恐懼，一個女人的幻覺，一個女人沉愛的為默，使這個男人成為作者之一。

還是這個女人，在 2003 年秋天，又一次舉槍，她對準她自己的作品，整整打了十五槍。

她對世人說出：「我是這件作品的唯一作者。」一場關於這件作品作者權的爭議，引出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。故事就從這一槍說起。

四月的江南是女人的天，陰風細雨，纏纏綿綿。中國南方，在天堂的城市杭州，我住在一棟靠近茶山的農家小樓。時鐘剛過正午，我懶懶的起床，拉起落地窗簾望出去，天下起濛濛細雨，傷感和陰雨，宛如一個憂怨的女人，在沒完沒了地哭訴無以名狀的悲哀。

「這鬼天氣，雨老是下個沒完，人都快發黴了。」我大聲抱怨起老天爺。

活的不耐煩了，放點音樂提提神。爵士樂帶着悠悠的節拍，在空氣中慢慢擴散開來，我把音量調到最大聲。

走進浴室，打開淋浴房水龍頭，水「嘩嘩」的從頭上往下流，低頭望自己略帶鬆弛的肌膚，長歎一聲，「老了！」一腦門子的怨氣，怎麼沖也沖洗不掉。

---

1. 中國美術館「中國現代藝術展」閉展：1989 年 2 月 5 日下午至 1989 年 2 月 9 日。

推開淋浴房，披上浴袍。耳邊響起「咯蹬咯蹬」的聲音，盜版碟就是這樣，我走過去關掉音響。緊接着，「霹靂啪啦」的兩聲在房頂上響起來，重重地打在頭頂上，心悶悶地往下沉。

泡上一杯濃濃的咖啡，走到書桌前，打開電腦，視屏上顯示出4月16日，「天啊！今天是我四十二歲生日，我都忘了！」只見右下角跳出一封來信提示，打開郵箱，是高天宇從美國發來的。我一口氣讀完它。

他在信中寫道：

……

我非常支援你將事實講出來。我也非常理解為甚麼在15年以後你開口說出真實的經過。不論甚麼原因，都不能遮掩事實。事實就是事實。對歷史負責是對一個人的人格의 考驗。而這一解釋者必須是你，因為你是最直接的當事人。儘管這裏可能有個人的感情等問題的介入，但是還歷史真相不是個人的事，是中國當代藝術本身的事。這件事也並非只是你和藍軍兩個人關於作者問題的糾葛問題，而是說明了在歷史發生的時刻，常常會有各種偶然的因素扭曲歷史，包括個人利益驅使下的改寫、媒體的渲染和塑造以及大眾的流言等。正像一些歷史學家所講的，法國大革命中充滿了謠言。從這一角度講，你的沉默是有價值的，因為它使那麼多人共同創造「流言」的現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。今天你對事實的揭露是對這一現象的最大諷刺。它也使我們這些「搞歷史」的人得到警訊。從個人思考出發的藝術作品和社會的解讀常常出現巨大的差距。在你開槍之前，作品是屬於你的，它是個人化的，但是當你打完槍並引起了社會的震動後，它的解釋權就不屬於你了。所謂的「打槍事件」，是打槍之後的事，打槍之前包括打槍本身應當稱為作品，而非事件。因為，據你講，你沒有考慮更多的之後的事，你也沒有設計之後的事。你只是想到你的作品本身的完整的問題。「事件」的作者很多，包括藍軍，但是根據你的描述，你是作品的作者，他不是。



我理解作為一個女人會為感情付出自己的名譽。正如你在信中所說，這件事也是一件關於女性主義的故事。特別是中國女性的故事。我很能理解你所說的，作為中國的女性你可能更能理解歷史創造的本質。

.....

高天宇是 1989 年北京「中國現代藝術展」展覽籌委會負責人。為澄清 1989 年作品《對話》作者權，從今年二月初，我分別給高天宇和宋力威寫信，一直在等待他們回覆。沒想到，在我生日這天，先收到高天宇的回信。

「非常高興收到您的來信，這是我四十二歲最好的生日禮物，今天是我生日。」我寫了這段話發過去。

窗外茶山上，隱約可見幾個茶農的身影，頭頂上的雨突然停了，周圍一片寂靜，我站起身，推門來到曬台上，對着遠方大叫一聲「耶！」

4 月 20 日，北京「美術同盟」網站，在吳易的編者按下，公開發表我與高天宇的通信。緊接着 4 月 23 日，網上出現兩篇文章，〈複製「槍擊事件」——女性主義的誤會〉，〈「槍擊」已矣，歷史已矣，於今何思——澄清，在於事實，情感還是美術史〉。

人們在發問，1989 年 2 月 5 日，在北京中國美術館，在「中國現代藝術展」上，那震驚中外的一槍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電話鈴在不斷地響，許多人打電話詢問此事。

「是不是藍軍和你分手，你用這種方式來報復他？」

「既然當年你就知道這件作品是你的，為甚麼當時不說話？」

「愛情真有這麼大力量，讓你將這麼大一個名聲與他人共用？」

.....

一連串的「為甚麼？」都不知如何招架。去衛生間，用清水抹一把臉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接到北京王銳電話，他邀請我參加2004年大山子798藝術節「越界語言2004『音量調節』」展覽。展出我剛剛複製完成的，在1989年2月5日「中國現代藝術展」上，槍擊作品《對話》的那件電話亭裝置。另一件作品是《十五槍……從1989至2003》。同時，還要現場做一個行為。王銳在電話中說道，「肖瀟，這麼多年，你沒有公開說過《對話》這件作品。在這個展覽上，你要發出你自己的聲音。」

「好！我馬上去北京。」匆匆收拾行裝，我踏上去北京的旅途。

計程車從龍井村下滿覺隴，途經南山路往飛機場方向行駛。在經過南山路浙江美術學院<sup>2</sup>教工宿舍大院高牆的一刻，我突然叫住司機，「停下來！停下來！」他一腳急剎車，我的頭往前一衝，重重地撞到前面座位上。「你不要命了！……」司機在罵罵咧咧，我好像甚麼都沒聽見。右手把車窗搖下來，望着眼前這個非常熟悉，與藍軍共同生活過的地方，一陣胃酸往上湧，「快走！」司機沒反應過來，我大聲提高了嗓門，「趕快離開這鬼地方！」

風透過窗戶「呼呼」直撲進來，渾身上下的燥氣直衝腦門。頭隱隱作痛，一摸撞出一個大包來，我使勁地揉，盡力抹去一些不愉快的記憶，可滿腦子的思緒，像一匹脫韁的野馬，拼命往相反方向跑，怎麼拉也拉不回來。

和藍軍十五年的同居生活結束了。就在半年前，在南山路上，藍軍以一種非常得意地口吻對我吼叫：「老子不需要你了！」他高高的仰起頭，揚長而去。

---

2. 浙江美術學院，1993年改名為中國美術學院。

南山路，長着茂盛的法國梧桐樹，樹枝橫跨寬敞的路面，透過陽光折射，將光影散落在灰色馬路上。這路上每一棵樹，都記載我的青春與滄桑，同時也承載我的痛苦與回憶。

在南山路上，有一所全國享有盛譽的浙江美術學院，我父母都在這所學院工作。父親曾是這所學院的院長，母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油畫系教授。當年，我曾經是這所學院驕傲的公主，整個大學生涯就在這裏度過。

計程車把我送到機場，時間晚了，我幾乎一路小跑的上飛機。這次去北京心情和以往不同，我怎麼也輕鬆不起來。

在機艙一個靠窗位子坐下，我繫上安全帶，飛機穿過厚厚的雲層上了天。透過窗戶，雲海在一團一團的騷動，像在吞噬甚麼，又像在預示甚麼。雲端之上的天空，藍的那麼純粹，這是人間見不到的藍，深邃而廣袤，沒有一絲雜質。想起李白詩句：「素手把芙蓉，虛步躡太清。」

天上真的有仙境嗎？人們常說的天堂真的存在嗎？要能坐上太空船，到星河去看看有多好。所有的煩惱，穿越時空，全都消失在天邊的銀河裏。我閉起眼睛，癡癡地想，情不自禁地笑起來。

「小姐，你笑甚麼？」臨座乘客的問話。

「哦！沒甚麼，做了個夢。」

「對不起，把你的夢打斷了。」

我深深歎口氣。無論自己在飛機上，還是甚麼別的地方，要想完全擺脫他人干擾是不可能的。這個世界就是一個人與人共存的空間，想超然世外，那是做夢。

經過近兩個小時飛行，飛機抵達北京首都機場。我上一輛計程車，對司機說道：「到大山子。」

「大山子？等半天，就拉你這麼近一個人，算我倒楣。」出租司機沒好氣地瞪我一眼。

沿機場高速，過五環，從大山子路口出去，穿過大山橋，計程車把我送到「798」工廠區，我暫時和一個叫趙曉樹的朋友，合租一間二百多平方米的工作室，這是通過舊廠房改建的畫室。

「798」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，北京一座軍工廠的番號，它是當時東德人的援建設計，典型的包豪斯式建築。歷經四十年的風風雨雨，它從繁榮逐步走向衰落。九十年代以後，大批工人下崗，許多廠房閒置。在這個時候，一批藝術家進入，使這個幾乎瀕臨倒閉的工廠有了生機。北京「798」藝術區就在這個破舊的廠房中誕生。

放下行李，來到「星星」工作室。推門進去，一些人正聚在一起聊天，「星星」工作室主人王銳，微笑地站起來，向我介紹另外兩位展覽策展人：Thomas 和光羽。

在一個由原木劈開製成的條凳上，王銳示意我在他身邊坐下。一塊水磨雪花石板做成的長方形桌子，大家面對面坐在兩旁。視線一下子集中到我身上，他們在朝我笑。

「你們笑甚麼？」我在問。

「沒甚麼，在網上看到你與高天宇的通信，覺得這事兒有點意思了。」一個叫 Thomas 的外國人先開口，「是嗎，有點意思？！」我接他的話岔子，「哦！是嗎？」

「這件作品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了。」王銳邊說邊給我倒上一杯白葡萄酒，我舉起酒杯，透過玻璃杯，看到對面的男人在向我微笑，他們在衝着我笑。恍惚中，笑聲變得荒誕而怪異，笑得我心裏發毛。我坐不住，起身想走。王銳示意我坐下，「別急，咱們還沒說正事兒，你在展覽開幕式上做一個行為，怎麼樣？以甚麼形式你自己決定，想排在第幾個做。」

「最後一個吧。」我本能的向後退。

「排在第一個吧！」

「好，隨你們安排，我先走了！」

匆匆逃離「星星」工作室，逃離那些怪異的笑。

我一個人廠子裏蹣跚，沿廠區小道，來到「At Coffee」咖啡館。要上一杯特濃義大利咖啡，一塊巧克力甜點，坐下來定定神。

牆上掛着部分廠區內展覽的招貼廣告。舊廠房遺留下來一塊當年的毛主席語錄，紅底黑字，透着時代痕迹，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。這是個藝術家喜歡呆的地方。

咖啡館進進出出的人羣，認識不認識的，似乎都挺忙碌。我毫無目的地注視着遊蕩的人流，在心裏琢磨；這些人都在忙些甚麼？他們坐在這兒，叫上一杯咖啡，喝着酒精或飲料，隨體內，也不清楚是從那個部位發出的信息，那種自我陶醉的神態，就像瀰漫在咖啡館裏的氣味，有一種讓人銷魂的魔力。

它是無形的，感知的，游離的，具體的，抽象的，盲目的……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在於每個人對生命未知的感悟。這些些活非現實裏的精靈，有着超凡脫俗的慾望，「藝術」只不過是一個說辭，其真正的意義，就在於那些生命中；可見或不可見，理性或非理性，說不清道不白的自然存在。

有人看到我，大聲地對我說，「咳！在網上看到你的信，寫得挺好的。」

「哦，是嗎？」還沒回過神來，又一個聲音，「整個一怨婦！」

……

我坐不住，起身離開「At Coffee」。

下班時分，廠子裏工人正成羣結隊地從車間出來，一個個急匆匆地往外走。迎面見一女工，我湊上前去，「咳！你好，看上去好像有點面熟，你認識我嗎？」

「這兒的藝術家，看着都有點面熟，就是分不清誰是誰。」

「沒甚麼！」我自我介紹着，和她套近乎。女工的腳步走的特快，我緊趕慢趕的跟上她。

「你有甚麼急事兒？」

「急事兒？趕回去接孩子，給老公和孩子做晚飯，這就是我每天的急事兒。我們的生活那像你們藝術家那麼自由，成天不着四六的。」

「你結婚沒有？」女工冷不丁地問我。

「沒有！」

「那肯定也沒孩子了。」

「是…是的。」我被她問的自慚形穢。女人生命中兩件大事，我一樣都不沾邊，眼下連男朋友也沒了，這日子真是過的有點暈。

「藝術家就是和我們活的不一樣，挺瀟灑的。」

「甚麼？瀟灑！」

「生活狀態呸！想怎麼着就怎麼着。那像我們，柴、米、油、鹽的。藝術家有點怪怪的，和我們常人不太一樣。」

「其實都一樣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就說你們弄的那些叫甚麼現代藝術，亂七八糟的，我根本看不懂，還有那麼多人說好，聽說還能賣出大錢。這東西，真是白給我都不要！」

「你說的對。這叫青菜、蘿蔔，各有所好。」

「那我是青菜還是蘿蔔？」

「你是青菜，我是蘿蔔，都是些維生素元素，沒甚麼兩樣。」女工被我的話逗樂了，我們總算找到共同點。邊走邊聊，我們一同走出廠區。

在酒仙橋大街上道聲「再見！」越過天橋，我一頭鑽進一家「美美理髮店」。

## 第二章

進了理髮店，對站在櫃檯後面的小姐說，「找人洗個頭，手重點，我有點兒頭痛。」

「沒問題，給你找個年輕小夥子。」

在一面鏡子前的轉椅沙發上坐下，瞧瞧自個兒那熊樣，塔拉着腦袋，神色暗淡。一個年輕男理髮師走到跟前，一大桶簡裝洗髮水，放在鏡前玻璃几案上。他用掌心按幾下桶上的壓力閥，手心握一掌洗髮液，右手拿一瓶塑膠瓶裝水，洗髮液和水在頭上一抓，立即生出白白的泡沫來。

「頭髮挺長的，留幾年了？」

「嗯，嗯，有個年頭了！」我漫不經心地敷衍他。記得十七歲那年，我到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附中上學，班上十個女生。有一天抽瘋，女生都去了家理髮店，「啾嚓」一下，全剪成短髮。第二天早上出操，清一色短頭髮站在操場上，把我們班男生給弄傻了。

「有二十多年沒剪了。」我脫口而出

「二十多年沒剪過頭髮？」理髮師吃驚的口氣。

「只是偶爾修修分叉，把頭髮剪齊就是了。」

「這麼多年不變髮型，看來你是個保守的女人。」

「保守？你說我是個保守的女人。」我琢磨理髮師這句話，覺得有那麼點道理。「這麼重可以嗎？」理髮師問我。

「再重一點，我的頭是很吃力的。」他使勁的又抓了幾下頭皮。

「好！就這樣，有點感覺。」我深深吐出一口氣。

髮廊裏播放着不知是誰的歌曲，一個女人的聲音，斷斷續續聽出一些癡情話語。

「啊！情是甚麼？來時也苦，去時也苦……」歌詞像咒語，聽得我腦袋更加痛了。

「誰的歌？」我問。

「蔡琴的。」

情歌牽動我感情生活最初的記憶。失戀，一切都變得模糊了……。

那年我十八歲。在上海的江寧路上，一個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男孩羅安，陪我走過記憶中，最最殘酷的一段路。

羅安對我說，「我和你同桌的女同學阿梅好了。」

「甚麼叫好了？」

「就是和她發生關係了。」

「甚麼叫發生關係？」

「就是發生男女關係。我以前從來沒有過，不知該怎麼辦？」

「那你告訴我，讓我怎麼辦？」

「你能原諒我嗎？」

「原諒！？」我原諒他甚麼？自己都搞不清和他到底是甚麼關係，只有那句「我們發生了男女關係」，讓我渾身的不自在。

羅安望了我一眼，不再說話了。他默默的推着自行車往前走，我低頭跟着他。我們誰也不說話，可怕的沉默。

「你回去吧！」我終於開口了。

「你沒事吧？我覺得你有點不對勁兒。」

「你走吧！！你對我說這些幹甚麼？！」我大聲的叫起來。男孩顯得有些窘迫，低聲說了句，「我走了！」匆匆騎上自行車遠去了。



我傻傻地站立在大街上，身體在發抖，發冷，發顫。周圍一切似乎都變了。在那個盛夏的夜晚，我哭了，我第一次哭得那麼傷心，抽泣的身體，在一團空白的記憶裏，第一次感到甚麼叫心痛。在還沒明白愛情和肉體之間是怎麼回事的時候，失戀的滋味開啓我情感生活的大門。那句「我們發生了男女關係」，像一支毒箭，深深刺向我的心。

「小姐，請到那邊把頭髮沖一下。」理髮師的聲音打斷我的思緒。我跟他走到一個連水池的斜躺式沙發，仰面躺下，水流聲就在腦後，

「要護髮素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沖洗完頭髮，回到原先位子上，理髮師從抽屜裏拿出一把梳子，邊吹邊梳理我的頭髮。從鏡子裏看，的確比剛才亮麗許多。

「下面給你做頭部按摩，你不是頭痛嗎？」理髮師將沙發後背調節到一定的斜度，我順勢躺下。一雙手在我眉眼之間推揉，是異性的手感。

「再重一點。」

「已經很重了，看來你頭痛的不輕，剛才洗頭時，看你閉着眼睛，眉頭也皺的那麼緊，一定在想甚麼心思？」

「都是些過去的事兒。」

「過去的就讓它們過去吧，別再想了。」

理髮師的手指按住我腦門兩邊的太陽穴，順勢揉捏着，「放鬆點，甚麼也別想，要徹底地放鬆。」

我默默念叨理髮師的話，盡力不去想甚麼，可爆竹聲又在耳邊響起來了。

過年了，小時候最喜歡過年。每年春節，我們家都和戚阿姨家一起過，從九歲那年起，年年如此。羅安就是戚阿姨家的大兒子。

「我媽媽打我，讓我在你們家躲一躲。」十五歲的羅安跑到我們家，氣喘吁吁地對我說。

「別怕，在我們家，你是最安全的，我爸爸媽媽從來不打我。」那天，戚阿姨把羅安領回家，再也沒打他。

戚阿姨家，住在上海江寧路胡同裏的一幢舊樓上，他們家有三個兒子。歲月的痕迹，如同一張褪色的黑白照片，一切都變了色，發了黃，影像漸漸淡去，但它們依舊存在。

農曆大年三十，總在戚阿姨家過。兩家人聚在一起包餃子，已成為習慣。而每年包餃子，總有一個小插曲：放一枚硬幣和一粒花生米，和着餃子餡，包到兩個餃子裏去。誰要吃到那枚硬幣，來年就有財運，誰要吃到那顆花生米，明年就有好運氣。

人就是一個「念想」，一個簡單的遊戲，把人們對未來的希望，都緊緊拴在那兩個小小的餃子上。記得有一年，小我九歲的妹妹歌歌，看大人們爭吃餃子，急的直跺腳，她大聲嚷嚷，「你們慢點吃，等等我！」最後，她乾脆站到凳子上，左右手開工，雙手去抓那些餃子，咬一口，沒見到錢和花生，就放在眼前盤子裏，接着繼續抓吃。那急不可待的樣子，真把大家逗樂了。

吃完餃子，大人們圍坐在一起，磕瓜子，吃零食，觀看一年一度的中央電視台「春節聯歡晚會」，他們在一起嚼舌許多大人們關心的話題。而兩家的孩子，在這個時候，就衝下樓去，在一樓和二樓之間的亭子間，盤腿坐在那張大雙人床上，擺開陣勢開始打牌。甚麼「四十分」、「拱豬」……，年年玩同樣的牌，年年為瞬間的輸贏，興奮不已。

戚阿姨家的家教特嚴，三個兒子被打是家常便飯。我們家比較自由。但在那天晚上，兩家孩子不管怎麼胡鬧，大人們都不會管。所以戚阿姨家的小三子烽烽說過，「我一年中，最盼望的就是這一天，沒人管我們了！」

「你好像又在想心思，臉上堆着笑，一定有甚麼好事兒。」理髮師的聲音把我從過年的喜悅中喚醒，他的手停住了。

「你別停下來，我正舒服呢。」

「小姐，已經做完了。」

「甚麼？這麼快就完了。」我躺在那兒不想挪窩，還沒過癮。

「要是你願意，再給你做個全身按摩，只要多付三十塊錢。」

「好！我願意。」

「請跟我來！」我被理髮師領到一間裏屋，只見六張單人床位，我脫下鞋，在其中一張床上躺下，理髮師順手拉上布簾子，他的手開始順着我身上穴位，緩慢而有節奏地推捏，「放鬆點，你肌肉有些緊張。」

呼吸隨身體微微起伏，我慢慢體味「放鬆」這兩個字的含義。放鬆，能徹底放鬆的日子，實在是太遙遠了。

小學二年級那年，我父母從杭州浙江美術學院調到上海油畫雕塑院工作，我跟他們來到上海，在上海復興中路一幢法式花園洋房的三樓，一住就是八年。那是一段我最最放鬆的日子。

上小學的日子，我迷上跳舞。三年級，學校舞蹈組要排練演出《白毛女》中的一場戲，喜兒這個角色是由一個和我同音不同名的女孩擔任，我跳羣舞。有一天，跳喜兒那個女孩突然生病，急需有人臨時頂替。我向老師提出能不能讓我試試，她看我一眼，「好吧！」就這樣，我真的演了一場《白毛女》中喜兒的角色。雖然只演一場，可當時甯提多高興。

北京中央芭蕾舞學校到上海招收學員，到我就讀的小學挑選舞蹈苗子，那個女老師看上我。她和我父母商量，要帶我去北京，要讓我去學芭蕾舞。父親有些猶豫，母親堅決不同意。

「我給你們一個星期時間考慮。」舞蹈學校的老師在懇求。母親一口拒絕，「我一分鐘都不需要考慮。」母親當時一句話，決定我的人生道路。

「為甚麼你不跟我商量一下，我那麼喜歡跳舞。」

「孩子，你還小，許多事情你不懂，跳舞的藝術生命太短，練功又很苦，你這麼小就出去，讀書都荒廢了。跳舞的人，都是四肢發達，頭腦簡單。」我不解的望着母親，覺得這些話也許是對的。

在那個年紀，我非常聽話。在家是個乖乖女，在學校是個典型「五分加綿羊」的好學生。記得母親有一次對我說，「你這個人怎麼沒脾氣，甚麼時候發個脾氣給我看看。」那時候，我純淨得像一汪清水。

我的舞蹈夢一直做到小學五年紀，一次意外，使我不得不放棄跳舞，開始學畫。

一個星期天的下午，院子裏幾個孩子在跳高，我從樓上窗戶往下看，他們在叫我，「下來吧！」

我跑下樓去。幾塊石頭疊放在凳子上，一根竹竿放在石頭上，大家跳的很輕鬆，「再疊高一點，太低了。」加了幾塊磚，跳了幾輪，又加上幾塊磚，該我跳了。一陣小助跑，一躍，腳被甚麼絆住，一頭栽倒在地上，右腳頓時失去知覺。大家把我扶起來，只見右腳在來回晃悠，「天啊！肖瀟的腳摔斷了！」大院裏的孩子們驚慌地大叫起來。我父母被叫喊聲招呼到樓下。父親一看，二話沒說，背起我就往醫院跑。

「你女兒的骨候是粉碎性骨折，需要立刻上石膏。」當天晚上，我整條右腿繃上白色石膏。醫生對我母親說，「你女兒骨折的位置不好，正好是長個兒的地方，將來弄不好，兩條腿會一長一短的。」

我問母親，「我再也不能跳舞了？」

「那當然，沒準兒，你還會癩的。」

「我將來會是個癩子？」

母親看看我，摸着那條上了石膏的腿，「你還是學畫吧，如果將來真的癩了，也不要緊。」

大街上，母親開始注意起櫥窗裏，為瘸子特製的加厚鞋跟的鞋。她就是不甘心，自己的女兒真的會變成殘廢。她到處打聽可能醫治的方法，最後找到一位老中醫，「我有一個偏方可以試試，但必須把石膏表面打掉，敷上中藥。你可千萬不能告訴西醫，他們絕對不允許這麼幹的。」

「西醫都說治不了，如果你能使我女兒腿不癱，只要有一絲希望，我就聽你的。」日復一日的敷藥，也不知是否有效，好在後來我還真長了點個兒。母親一個果斷決定，保住我的腿。

平時沒覺得甚麼不對勁，後來到北京上學，體育課去北海溜冰，右腳踩着溜冰鞋往冰場上一滑，人立即摔倒在地。我右腳根本支撐不住身體的重量，只能靠左腳單滑。

那次骨折，在家呆了三個多月，不是在床上躺着，就是拄着拐杖在房間裏轉，悶的心裏直發慌。有一天，我突然說道，「爸爸，我想學畫！」

「太好了！我女兒終於想學畫了。」父親高興的拿出一本蘇聯畫冊讓我臨摹，記得那本畫冊是蘇聯畫家謝洛夫的。在打發腿傷的無聊日子裏，我開始學畫。

周末，妹妹從福利會幼稚園回家，她是我第一個模特。從小她就愛美，每次畫速寫，她總要說上一句，「畫得好看一點。」歌歌對美的敏感是天生的。記得在她很小的時候，我們一起去看電影，散場後，我問她電影裏講些甚麼？她說不清楚，「姐姐，我畫給你看。」回到家，她一張張的畫，嘴裏還念念有詞的說個不停，「……這件衣服我最喜歡，就是顏色太豔了。」

「請問你是做甚麼的？」理髮師的突然發問，讓我一愣。

「甚麼？你問甚麼？」

「小姐，你是做甚麼行業的？」

我一時無從回答，「我……，我不知道。」理髮師的手停住了，然後非常肯定的說，「我知道，有個好老公養你。」我真是哭笑不得。

「甚麼？老公？」多陌生的詞兒，這輩子都沒跟它發生過關係。本想去爭辯，可一轉念，還是不去說的好。誰能理解我這種生活狀態，沒有老公，沒有孩子，沒有家庭，沒有工作，沒有……。

我敷衍他，「小夥子，你說的對，我有一個好老公養着。」理髮師讓我翻過身去，開始捶打後背，兩隻手像在案板上剁菜，快速地敲個不停。「我怎麼看你都不像那種被老公養的人。」理髮師又在發問，他對手下敲打的這個女人，充滿好奇。

「我是畫畫的，在學校裏教書。」我想用一種常人的思維來回答他，省得他問個沒完。頭頂上的天花板，一盞昏暗的黃燈泡在晃動，光線透過竹編的燈罩，照在灰暗的牆壁上，恍恍惚惚的光影瀰漫開來。

思緒又回到從前。

那年我十七歲，從上海市第二中學，考上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附屬中等美術學校，而戚阿姨家的大兒子羅安，在北京讀完中央音樂學院，分配到北京兒童藝術劇院，在樂隊裏拉小提琴。

在我去北京上學之前，和戚阿姨家的大兒子去了一趟杭州。我至今還記得那次旅行，自己和羅安，被安排在一輛完全封閉的小型軍用卡車後面，而羅安的父親則坐在駕駛室裏。車子啓動了，厚厚的軍綠色帆布掛下來，汽車一顛一顛地往杭州方向開，偶爾透過的光線，照在我和這個男孩的臉上，時明時暗的，該不是個好兆頭。

也不知是不是大人的特意安排，將這對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命運，強行安排在一輛完全封閉的軍車裏。

汽車從上海到杭州要坐三個多小時，好像就在那次，我第一次感到和眼前這個從小一起長大，非常熟悉的人，有些不自然。平日裏，大人們總在暗示我們的未來，但這個未來究竟是甚麼？結婚這個具體而又抽象的詞，到底意味着甚麼？

應該說，在我真正對異性產生好奇與好感的年紀，和羅安並沒有在一起。那時他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上學，而每年春節、寒暑假的偶爾見面，也是和戚阿姨家三個兒子一起玩。要說真正讓我接受的，還是對戚阿姨這個家的親近。

有一個和自己一起畫畫，叫曉強的，還真的讓我曾經有過一種莫名的惦念。我們在一起畫畫，讀書，談天。漸漸地，我開始期盼窗下他的叫聲。每當我聽到他呼叫自己的名字，就會興奮地衝下樓去開門。現在回憶起來，那種感覺還在。記得就在我將要去北京的一個夜晚，曉強非常靦腆地對我說，「你要去北京上學，我想每個月給你寄點生活費。」

「為甚麼？」

「因為我喜歡你。」

心裏一陣慌亂。這是在我生命中，第一次一個異性對自己這麼說，既興奮又突然，既羞澀又不知該怎麼辦？我把這件事告訴母親，「孩子，你現在年齡還小，考慮這個問題還太早。如果將來結婚，婆家最重要。戚阿姨對你那麼好，跟她的兒子好，聽媽媽的話，沒錯！」

結婚，婆家，這麼具體的未來，一時無法給自己下決斷。曉強在等待答覆，我必須做出選擇：是戚阿姨的大兒子？還是曉強？在對自己未來沒有判斷力的時候，我把自己的命運，完完全全地交給對母親的絕對信賴上。就這樣，我拒絕了曉強。

那是一個發夢的年紀，對愛的幻想處在朦朧的游離狀態，一下子具體到一個活生生的男人身上，真有些害怕和膽怯。青春期的夢想，就是在不確定的關係中，去體味一種抽象的浪漫。

軍車在往杭州方向行駛，我和羅安面對面坐着。他戴一副眼鏡，斯文中帶些靦腆。氣氛有點沉悶，我心裏直犯嘀咕，這就是母親說要結婚的那個男人。想着想着，我不敢再看他了，慌忙從包裹拿出一本英語書。

「看甚麼呢？」

「《新概念英語》。」我低着頭。

「車裏光線太暗，你看的見嗎？」

「我視力是 2.0 的。」

我們相對不語。他望着車外，我低着頭，眼皮底下的英文字母變得模糊不清起來，腦子裏開始漫無邊際地遐想。甚麼「青梅竹馬」、「兩小無猜」的詞出現在眼前，這種感覺從模糊到真實，又從真實變得遙遠不可及。思緒飄呼不定的遊蕩起來，兒時的記憶引導我，陷入一個自己編織的夢裏。

「你怎麼不說話？」羅安問我。

「我……」抬頭看他一眼，又趕緊避開。

那次旅行，在我的記憶中並沒有多少浪漫，但有一種焦灼的情緒，在等待未知的未來。

從杭州回到上海，戚阿姨要我和他們全家去一家照相館，我們拍了一張非常正規的家庭式「全家福」。當看到自己站在那張「全家福」照片中間，心裏頭怪怪的。

從形式上，我已經走進他們家。

理髮師的手沿大腿往下走，伸向我雙腿之間，隔着單薄的褲子，重重推捏女人最敏感的部位，用他的手指，「別，別這樣！」我用力阻止他的繼續，翻過身去。

「你怎麼了？怕甚麼？」

理髮師用力把我身子舒展開來，透着單薄的衣服，從上到下撫摸我，嘴裏輕輕地說道，「放鬆一點，放鬆一點，你會很享受的。」我屏住呼吸，閉上雙眼，我感到一陣快感。

胸口一陣說不出的噁心，我猛地坐起身，再也不敢去看理髮師的臉，我驚慌的穿上鞋子，衝出那間屋子，匆匆來到櫃檯，付了四十塊錢，頭也沒回地推門走出理髮店。



我跑着回到畫室。

夜，寂靜無聲的夜，空蕩蕩的大畫室，無法言說的情緒壓得我喘不過氣來。我進了浴室，打開淋浴龍頭，拼命地沖洗自己的身體。我哭了，我放聲大哭起來。不知為了甚麼，是那段初戀的回憶，還是為理髮師那雙手？我哭的好傷心，抽泣的身體，根本無法控制自己。

那一夜，我只知道哭，沒完沒了的哭，沒有人在我身邊，只有自己孤零零一個人。哭着哭着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